

[台湾商务印书馆学术经典]

马一浮

熊十力

张君勱

蒋中正

陈大齐

太虚

戴季陶

中国历代思想家

现代

(二)

主编：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中国历代思想家



(二)

主编：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思想家. 现代. 2 / 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主编; 李霜青等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08-0857-9

I. ①中… II. ①中… ②王… ③李… III. ①思想家
—评传—中国—现代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6374号

中国历代思想家. 现代. 2

作 者	中华文化总会 王寿南 主编 李霜青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5.125
字 数	37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857-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马一浮 / 1

熊十力 / 99

张君勱 / 171

蒋中正 /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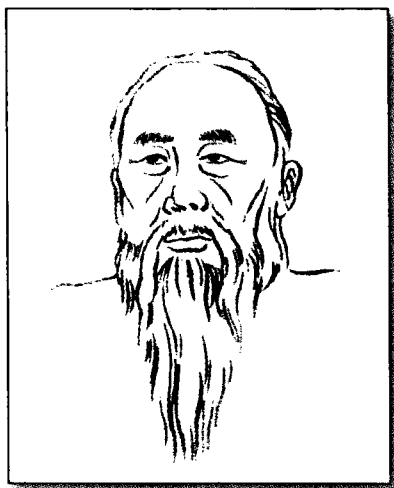
陈大齐 / 329

太 虚 / 361

戴季陶 / 391

马一浮

郑大华 著



目 录

一、生平事迹	5
1. 绍兴一神童	5
2. 发愤苦读书	7
3. 讲学与刻书	11
4. “落日下崦嵫”	15
二、思想来源	17
1. 佛家思想	18
2. 道家思想	24
3. 儒家思想	28
三、主要著作	34
1. 《泰和宜山会语》	36
2. 《复性书院讲录》	40
3. 《尔雅台答问》	45
四、“六艺论”	50
1. “国学者六艺之学也”	50
2. “六艺赅摄一切学术”	54
3. “六艺统摄于一心”	61

一、生平事迹

1. 绍兴一神童

马一浮，浙江绍兴上虞长塘乡后庄邨人，乳名锡铭，幼名福田，后改名为浮，字一浮，别号湛翁，取《楞严经》：“如湛巨海，流浮沤起灭元从”之义，晚号蠲叟，或蠲戏老人，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之义，一生还用过“忧生”、“耕余”、“太渊”、“一佛”、“藏用”、“被褐”、“圣湖居士”、“宛委山人”、“服休”、“圣湖野老”、“夕可老人”、“绥山老衲”等笔名和别号。

公元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其时他父亲马廷培正游宦四川，为仁寿县知县。廷培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仕宦学者。清咸丰十一年，因他伯父兰舫公在四川仁寿县廷尉职上战死，死后无嗣，他以序宜为后过继给兰舫公为嗣子。入川后，他先是究心经世学，凡法制、条例、刑名、钱谷及掌故民物，无不精通。后来被四川叙州府知府招为幕僚，不久即擢升为四川潼川府通判，最后调任为四川仁寿县知县。为官期间，他勤政清廉，声名卓著，深得老百姓的爱戴。后因生母倪太恭人去世，上司未准回籍治丧，而悲念阴郁，遂辞官回到杭州。那一年马一浮才有六岁。廷培有孩子四个，前三个皆为女孩，男孩仅马一浮。为

了使儿子能荣祖光宗，他对一浮的教育十分严格，经常告诫儿子要读史通经，深究儒家的义理之学。如他告诫儿子说：“立身制行之道，约之以不苟二字。不苟，即主敬也。事事不苟，然后能事事体察，以深其条理，主敬穷理，一以贯之，非有二也。”这些告诫对马一浮日后研究儒家义理之学，并成为一代儒宗，是大有影响的。

马一浮自幼聪敏，勤奋好学，有神童之称。他三岁开始在母亲何定珠的教育下认字读书，五岁即能吟诗对句，八岁能作诗，九岁能诵读《文选》、《楚辞》，到十岁时，已能出口成章。据说，他十岁那一年，母亲患疾，自知不起，为了考察儿子的才学，看他将来能否有大的出息，一天，她指着庭前盛开的菊花，命儿子作五言律诗一首，并限麻字韵。马一浮未加思索，应声而就，诗云：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羨胡麻。

母亲听后十分高兴，认为他长大必能作诗，但又觉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间烟火，只怕一生“少福泽耳”。这就是文坛盛传的马一浮的“神童诗”、“菊花诗”。此事不久，母亲病故。他父亲为了使马一浮能得到名师指点，特地为他延聘了一位很有声望的老举人郑墨田先生来家教读。但没多久，这位郑老先生即提出辞职。他父亲以为是儿子不听管教，惹老师生了气，或是家人怠慢了老师，经再三盘问，才知道孩子的才智非凡，在某些方面已超过老师，老师自感不能胜任，又怕耽误人家子弟学业，所以自请辞馆。他父亲开始不信，亲自试教后，才相信儿子果然颖悟异常，所读书籍能过目不忘，不禁暗暗称奇，自叹弗如。从此，他不再为儿子延师，听任

自学。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不满十六岁的马一浮奉父亲之命，赴绍兴县城参加县试。当时，他父亲已患病在身不能陪往，特意托了一位身强力壮又懂事理的乡亲结伴赶程。马一浮的家乡长塘离绍兴县城有四十里之遥，由于当时交通落后，一无汽车，二无轮船，如要乘埠船，还需要先走十八里的旱路。这是马一浮第一次出远门，他人又长得矮小，走不多远就走不动了，而要赶上那趟班船，不走又不行，最后只好苦了那位乡亲：“骑在我的头上赶路吧。”据数据记载，参加县试的有好几位日后都成了知名人物，如鲁迅兄弟，竺可桢的哥哥等。考试的结果，马一浮竟独占鳌头得了个全县第一名。本来马一浮就有“神童”之称，这一下更是名声鹊起，其闱卷被人誊抄，广为流传。当时绍兴有一位名叫汤寿潜的社会贤达（汤后来是著名的立宪派领袖，辛亥后尝做过浙江第一任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看到流传中的闱卷不禁拍案称奇，大为赞赏，认为马一浮日后必成大器，于是，挽人执柯，将长女许配给他。这样，马一浮就成了汤寿潜的东床快婿，受业门生。

大概是福祸相依的缘故，马一浮成为汤家的东床快婿不久，家庭便迭遭不幸，先是二姐一病不起，接着是父亲病辞人间，父亲病逝后的第二年，妻子又魂归西天。妻子死时马一浮才二十岁。也许是这一连串的不幸对他的打击太大，也许是他对妻子的感情太深，此后马一浮没有再娶。他曾告诉那些劝他续弦的亲朋好友说：“孔子的子孙是濂、洛、关、闽，而不是曲阜的圣衍公。”所以马一浮一生没有子嗣。

2. 发愤苦读书

其时，经过戊戌变法的洗礼，新学在中国逐渐兴起，为了探究

新学，接受新知，一八九九年马一浮与汤寿潜的另一受业弟子谢无量一同赴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和拉丁文。

一九〇一年，他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同创办了一份名叫《二十世纪翻译世界》的杂志。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以期唤起民众，振兴中华。一九〇三年，马一浮因迭遭丧姐、丧父、丧妻的不幸，思图远游。当时正好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聘一位既懂中文又懂英文和拉丁文的秘书，马一浮便报名应聘。是年六月，他东渡太平洋，到设在美国北部圣路易斯城的留学生监督公署走马上任。在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和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秘书外，马一浮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接受新知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亚里士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鲁索、但丁、拜伦、莎士比亚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从他的日记来看，他读过的书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拜伦诗》、《佛教原理论》、《日耳曼社会主义史》、《宾塞尔伦理学原理》、《达尔文物种由来》、《孔德传》、《狄摩斯谛尼演说集》、《但丁诗》、《莎士比亚集》等，并用英文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和《法国革命党史》。这期间，他还买了两本《资本论》。实际上，早在出国之前他就听说马克思写有一本《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买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一家“约翰书店”去买书，竟不想书架上有一本英译版的《资本论》。他大喜过望，立即买了下来。在日记中他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蚤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后来，他又买了一本德文版的《资本论》。

一九〇四年五月，马一浮携带他买的两本《资本论》经日本回

国。当时，谢无量、马君武都在日本留学，他们劝马一浮也留下来，马一浮便在日本西京逗留了半年，向一位名叫鸟隆谦三的日本友人学习日文，于是年十一月才与谢无量一起回到祖国。据杭州师院的赵士华女士研究，马一浮带回的《资本论》是进入我国的第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后来，马一浮将他带回的两本《资本论》，英文版的送给了谢无量，德文版的送给了当时上海的“国学扶轮社”。

马一浮回到祖国后，还是继续他的读书生活，先是与谢无量在镇江焦山海西庵隐居了一年，刻苦研读西学，期间曾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唐·吉珂德》，题为《稽先生传》，刊于上海《独立周报》上，笔名“被褐”。后又一人在杭州西湖广化寺借居了三年，天天到广化寺附近的文渊阁借览《四库全书》。据说，文渊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有三万二千七百多册，马一浮基本上借阅一过。正因为马一浮学习勤奋，读书殊多，所以他的好友弘一法师（即李叔同）曾告诉弟子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还不及马先生之多。”（见丰子恺《桐庐负暄》）几年的广阅博览，大大丰富了马一浮的国学素养，这也就为他日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阐发儒学义理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尽管马一浮自美回国以后闭门谢客，潜心读书，然而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他仍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其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正日益高涨，风起云涌。马一浮虽然没有参加任何革命团体，但他对反清革命运动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一九〇七年，秋瑾、徐锡麟二烈士因反清革命被清政府杀害后，他悲愤异常，并挥笔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排律诗，声讨满清政府，悼念革命烈士，相信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隐雾来玄豹，神飙动赤虬”，两位烈士倒下了，但会有更多的像“玄豹”、“赤虬”

那样的革命志士起来与清政府斗争，推翻清政府。辛亥革命后，浙人改葬徐锡麟遗骸于孤山之阳，马一浮为之特撰《烈士徐君墓表》。

正如马一浮所信念的那样，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多年之久的清政府终于被辛亥革命推翻。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与马一浮有世谊的蔡元培在临时政府中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蔡元培走马上任后，即致函马一浮，邀请他来教育部任秘书长，襄助部务。本来马一浮当时正潜心于祖国传统文化之学，对做官毫无兴趣，但念及自己不仅与蔡有世谊之交，而且彼此还很倾慕，于是勉强答应了蔡的邀请，到南京任职。但他到任不满三周，就因不善官场应酬而提出辞职。他对蔡元培说：我这个人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仍回西湖去读书吧。辞职回到杭州后，他身居陋巷，潜心读书。后来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又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但马一浮未加思索，即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回电辞之。一九三〇年，陈百年继任北大校长，因倾慕马一浮的道德文章，几次函电邀请他到北大任教，也被一浮婉言辞谢。几乎同时，他还谢绝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几次邀请。

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他自美经日本回国，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长达近三十年的时期内，除民国元年担任过三个星期的教育秘书长外，马一浮基本上是隐迹林下，潜心读书治学。回国的第一年他读的主要是西书。然而从第二年即一九〇五年底起，他则转为读中国古书，凡中土九流百家之学，汉宋经师论、文史词章、小学杂记，无不涉猎。其间还致力过训诂考据之学，但不久就觉悟其非，认为即使训诂严密，考据精确，于自己身心及民风政教了无干涉。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前后，马一浮读书的兴趣又发生变化，从广阅博览转为主要读佛道二氏经典，自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这十年间，他几乎通读过“三藏十二部”等佛学著作和《老子》、

《庄子》等道家著作。到了一九二七年前后，他又觉得“禅”是闲名，大可束阁。性是实德，必须亲证，与其涉猎二氏之学，还不如“归而求之六经，取法宋贤”。于是他读书兴趣再次发生变化，从佛道二氏经典变为主要读儒学经典，尤其是对儒家六经开始做认真的研究。马一浮虽然身居陋巷，不求闻达，但随着他学业日进，名声也因而大著，加上他为人宽厚耿直，因而深得学术界的推重和敬慕，当时海内学者来西湖质疑难者是络绎不绝，来者莫不为马一浮的博学通治所叹服。一些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寅初、汤用彤、朱光潜、李叔同、苏曼殊等都和他磋切过学术，并与他保持着深厚友谊。

3. 讲学与刻书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马一浮平静的读书治学生活。抗战初期为避战争烽火，他携带书籍万卷由杭州南迁，先居桐庐，后转开化，不久因日寇进逼，怕书籍遗失，乃致函时在江西吉安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请他代谋为所携书籍找一妥善的寄存之处。竺可桢收函后，即飞电马一浮邀请他以大师名义到江西泰和浙大讲学。在当时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马一浮不得已改变初衷，接受了竺可桢的邀请，于一九三八年春节后不久到了泰和。

马一浮在泰和讲的内容是国学。他以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教为宗旨，系统阐述了他的“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义理名相论”在泰和没有讲完）。听讲的除文科的学生外，还有包括竺可桢在内的各系教授，如文科教授梅迪生、张其昀，理科教授苏步青都听过他的讲学。他讲学的时间不分星期，是“逢五”进行，即每月的五号，十五号和二十五号，风雨无阻。为什么要“逢五”上课呢？他解释道：“定

五号为讲期自有义在。十即是一，故数穷于九，而五居中。皇极位次于五，亦是此理。”在此期间，他还应竺可桢的请求，为浙大创作了校歌歌词。是年六月，浙大举行毕业典礼，马一浮应邀在典礼上向毕业生发表演讲，鼓励学生要树立“抗战必胜，正义必伸”的坚定信念。马一浮在泰和共讲了十一讲，后来讲稿辑成为《泰和会语》，公开问世。

马一浮在江西泰和大约住了半年之久。一九三八年八月，赣北战事日紧。为避日锋，浙大师生于是月十三日起，分批乘卡车西行，经湖南衡阳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没有随浙大师生一起走，而是南行过大庾岭，入广东，走水路到广西柳州，再乘车北上到桂林，与旧友马君武（时任广西大学校长）及弟子丰子恺、吴敬生相聚，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才离开桂林，到了宜山，继续他的浙大讲学。马一浮在宜山共讲了九讲，其主要内容是讲他在泰和没有讲完的“义理名相论”。他在宜山讲学的讲稿，后来辑成为《宜山会语》，与《泰和会语》一道合刻出版。

马一浮虽因形势所逼而接受了竺可桢的邀请，以大师名义到浙江大学讲学，但其内心深处则对大学制度抱有成见，认为在大学制度下，学生“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用世，则心性非所先”，不能造就符合儒家理想的人才。这也是他所以三番五次地拒绝到北大、浙大任教的原因之一。故此，他到浙大不久，即在给弟子刘伯闵等人的通讯中，流露出想离开浙大，另找一处山水胜地，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愿望。刘伯闵是国民党CC系的干将。他于是将马一浮的这一愿望告诉了CC系首领、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陈又将它转告给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蒋对马一浮的道德文章早就心存敬仰，加上其时国难当头，需要网罗各方人才，以树立自己礼贤下士的形象，他便指示教育部向行政院提出议案，经院会通过，以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名义，向正在宜山讲学的马一浮发出邀

请电，除表示敬慕之意外，恭请他主持拟议中的书院，并告诉他，政府“已拨定基金”，作为书院经费。于是，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马一浮离开宜山，到了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在离开宜山时，他曾作《将去宜州留别诸讲友》诗一首，向浙大告别，诗中写道：“故国经年半草莱，瘴乡千里历崔嵬。地因有碍成高下，云自无心任去来。丈室能容师子坐，褒斜力遣五丁开。苞桑若系安危计，绵蕞应培禹稷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九三九年八月，书院宣告成立。书院设置董事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屈映光、陈其采、陈布雷、叶楚伦、周钟岳、陈果夫、寿毅成、沈尹默、邵力子、谢无量、熊十力、刘伯闵、贺昌群、赵尧生、梅迪生、张晓峰、梁漱溟、朱铎民、况敬仲等为董事，屈映光为董事长，陈其采为副董事长，刘伯闵为总干事。董事会又聘请马一浮为主讲并总摄书院事务。书院经费，除蒋介石拨三万元专款作为建院基金外，另由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每年给预定额补助。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根据马一浮的建议，称为复性书院。为什么要称为“复性书院”？马一浮对此曾在《书院名称旨趣及其简要办法》中作过说明，他说：书院，在古代的时候以地名命名，如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等，进入近代以后开始出现以义命名的现象，如诂经书院、尊经书院等等皆是，今如果以义命名，可命名为复性书院。因为“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从马一浮的上述说明中可以看出，复性书院与一般的学校或研究院不同，它实质上是宋明时期的书院在现代的新版。

是年九月十五日，复性书院正式开讲。本来按照马一浮的计

划，书院应开设“四学”，即“玄学”、“义学”、“禅学”和“理学”，并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禅学”，“理学”则由他本人担任。但不料谢无量和肇安法师婉言谢绝，熊十力虽然接受了邀请，但开讲不久，即因对书院规制发生意见而离开书院。不得已，马一浮只好独自承讲六经大义，其讲稿后来被辑为《复性书院讲录》。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只讲了四个学期，就因为不满当道者所为而停止了讲学。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备核。马一浮对此事十分愤慨，严辞拒绝。因为在书院正式创办之前，他在写给教育部的《书院名称旨趣及其简要办法》中明确提出：“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之有教外别传。应超然立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限制。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凡在书院师生，不参加任何运动。”教育部当时不仅对此表示同意，而且还明确表示，对马一浮“始终以宾礼相待”，彼此不存在隶属关系。故此，在收到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备核的通知后，马一浮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的诺言，并决定辞去讲席，专事刻书。后经陈立夫和书院董事会的一再挽留，他才勉强答应再讲半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写了一篇《告书院学人书》，表示自一九四二年一月起，书院“将以刻书为职志”，“以便寓讲习于刻书”，“庶使将来求书稍易，不患无书可读”。

为了筹集刻书经费，马一浮于一九四二年初写了一篇《蠲戏老人刻书启事》和一首《神助篇》的诗，向四方友朋宣布他将“鬻字刻书”的心愿，他同时向董事会表示，将以笔润“易馐粥”，不受书院一粟一币。经过一段时间的鬻字，加以朋友和弟子们的自动捐助以及他本人的平时积蓄，共筹集到刻书资金二万多圆。马一浮

对刻书工作非常重视，他曾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他并亲自起草了《复性书院拟刻诸书简目四种》，其中拟先刻《群经统类》四十二种，《儒林典要》三十六种，《文苑菁英》二十种，《政典先河》十六种。除此，他还拟有计划地组织编刻《诸子会归》，从周秦、两汉、魏晋以迄隋唐、宋代等诸子，凡一百十四家六百二十七卷的古书。虽然由于经费和人力的限制，实际上在马一浮的主持下，复性书院先后只刻了《群经统类》和《儒林典要》等丛书共二十八种，三十八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编刻这么多的书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马一浮的刻书为保存祖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翌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二十日马一浮也自重庆乘飞机经上海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杭州。这时，复性书院也迁移到了西湖的葛荫山庄。本来他打算就此离开书院，但经复性书院董事会的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同意仍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继续刻书。然而同时表示，不受书院敬修，其薪金全部捐作刻书资金。如此，他又主持复性书院刻书工作约一年半之久，直到一九四八年初，他才离开复性书院，结束了长达近十年的半讲学半刻书的生活。

4. “落日下崦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大陆易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马一浮应弟子蒋苏庵之请，迁移到花港蒋庄居住。一九五二年四月，出于对马一浮的敬仰，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的陪同下，轻车简从，到蒋庄拜访了马一浮。据说，陈毅拜访之先，曾在上海向沈尹默问过马一浮之为人。沈告诉陈毅，“其